

王元化 主编

海外
汉学
丛书

【法】谢和耐 著

●
中国和基督教

上海古籍出版社

556458



2 021 7168 4

王元化 主编

海外汉学丛书

中国和基督教——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

〔法〕谢和耐 著 耿昇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Jacques Gernet
CHINE ET CHRISTIANISME

根据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 1982 年版译

海外汉学丛书

主编 王元化

丛书常务编辑 王镇远

本书责任编辑 达世平

丛书封面设计 任意

海外汉学丛书

中国和基督教

——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

〔法〕谢和耐 著

耿昇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插页 2 印张 12 字数 257,000

1991 年 8 月第 1 版 199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7000

ISBN 7-5325-0806-4

B·95 定价：5.30 元

译者的话

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问题是当今国际上的热门学问。1982年是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年)入华传教400周年(1582—1982年),世界上许多地方在此前后都举行过纪念性的学术讨论会。1982年在意大利利玛窦的故乡玛切拉塔和罗马、美国的芝加哥罗耀拉大学、比利时的鲁汶大学和法国都举行了国际讨论会。1986年,比利时鲁汶大学又举行了有关入华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年)和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2年)的学术讨论会。法国于1974—1986年以每三年一次的周期共举行五次有关这一问题的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译者有幸参加了1986年9月间召开的第五届尚蒂伊国际讨论会(其主题是“欧洲与中国社会的接近”)。近年来,欧美国家出版了大批有关入华耶稣会士与明清间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甚至以此为契机而掀起了一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和中西文化比较的高潮。

法国科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教授、当代世界上第一流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先生1982年为纪念利玛窦入华传教400周年而于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Gallimard)出版了一部《中国和基督教》的重要论著。此书一出

版便引起了各国学者的高度重视。仅译者所知,该书于1984年由阿德里亚纳·克雷斯佩·博尔托利尼(Adriana Crespi Bortolini)译作意大利文,在意大利卡萨列·蒙菲拉托(Casale Monferrato)的马里耶蒂(Marietti)出版社出版。1984年,由克里斯蒂纳·玛德尔—维拉格(Christine Mäder—Viragh)和皮埃·布伦(Pierre Brun)译成德文,在瑞士苏黎世和德国慕尼黑由阿尔特米斯·维尔拉格(Artemis Verlag)出版社出版。1986年,由贾雷德·莱奥伊德(Jaret Lioyd)译成英文,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和法国人文科学出版社在剑桥和巴黎出版。荷兰莱敦大学汉学研究院院长徐理和(E. Zürcher)称此书为近年来有关这一内容的最佳著作,但西方神学界的一些人也对该书提出了不同意见。

谢和耐教授目前是法国汉学界的头面人物。他目前任法兰西学院教授,主持该院的“中国社会和文化史”讲座。他自1976年出任法国和荷兰合作出版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汉学刊物《通报》(创刊于1890年)的法方主编(荷方主编为莱敦大学的徐理和教授),自1980年起又出任与日本合作出版的佛教百科全书性刊物《法宝义林》的主编。他自1979年被选为法国科学院的唯一一名汉学家院士。

谢和耐教授于1921年12月诞生于当时的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其父为文学教授、古代希腊法学和宗教专家。谢和耐于1942年之前在阿尔及尔文学院完成了其法文、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学业。1942年在德国法西斯践踏法国及整个欧洲时,投笔从戎,应征入伍,于1942—1945年在法国军队中参加了反击德国法西斯及其盟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于1945—1947年在巴黎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学习汉语,

于1948年毕业于法国高等实验学院。他在1949—1950年间为当时设在越南河内的法兰西远东学院的成员。1951—1955年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助理研究员,1955—1976年任高等实验学院经济和社会学系的研究导师。1957—1969年间曾任巴黎大学文学院的教授。1969—1973年间任巴黎第七大学东方语言和文明教学和研究一体化机构的教授。从1975年起任法兰西学院教授。他曾于1949年、1957年、1966年、1980年、1985年到我国大陆、1974和1980年到我国台湾,1966—1967年到我国香港与中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他还遍访欧亚两大洲的许多国家以从事讲学和研究工作,宣传和研究中国文明。

谢和耐教授的汉学著作颇多(详见其著作目录)。他不但是一位多产的作家,而且也是一位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汉学家。

本书是从高深层次上论述中西文化比较和交流的著作,它是一个典型的欧洲汉学家研究这一问题的代表作。它把大量的汉文典籍的译文与西文史料结合为一体,对于许多问题的观点是公正和客观的。本书成了西方研究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之交流和比较的代表作,我们甚至可以说它形成了一家之说。大家从本书的众多西文译本这一事实中便可以窥见其重要性。

近年来,对于中外,尤其是中西文化交流和比较的研究在国内外都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浪潮。但恕我直言,直到今天为止,大多数研究仍停留在低浅层次和通俗介绍的范围内,触及到高层次文化的著作仍为凤毛麟角。要想扩大有关这一学科的纵深研究成果,我们有必要广泛地吸收国内外各家学者的

观点,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借用它山之石攻玉。谢和耐教授对史料的取舍剪辑、观察问题的角度、从事科学研究的方法以及他所站的立场均与中国学者不大相同。这正是我们自己在科学研究中需要借鉴的地方。更何况,谢和耐教授又是一位当代欧洲老一代汉学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著作也颇具代表性。此书出版之后,学术界的许多学者(如法国的奥班、马培安、伊莎贝尔以及荷兰的徐理和)大都表示赞同,而神学界的许多学者(尤其是当代的耶稣会士们)则持异议。因为谢和耐先生在本书中详细分析了明清鼎革之际中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在政治、历史、社会、思想、文化,尤其是世界观和伦理方面的殊同。他认为中国虽然可以与基督教世界接触和交流,有些中国人可能从表面上被归化为基督徒,但中国永远不可能被彻底“基督教化”,中国人也很难具有西方基督徒们的那种思想意识,而是始终都顽固地执著他们自己所特有的文化和伦理传统。这就使那些雄心勃勃企图使全世界都“福音化”的基督教神学家们感到不快。

我们回顾一下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比较和文化交流史,那就会不无惊奇地发现世界三大宗教于其中所起的巨大的和桥梁性的作用。作为印度文明之代表的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经过同化和改造,不但逐渐形成了我国西藏、蒙古以及其他地区和民族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了中国历代与南亚、东南亚以及中亚的某些地区和某些时代进行文化交流的工具。作为阿拉伯—波斯世界之文化基础的伊斯兰教自唐代传入中国,经过1000多年,不但形成了中国回族、维吾尔族、东乡族、撒拉族等民族文化的因素,同时也成了中国与波斯—阿拉伯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渠道。作为希腊—罗马文明

之标志的基督教自唐代入华(景教),经过元代的发展之后曾有过一段低潮,直到明清以来才较为广泛地在中国传播,也融合为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一个方面,同时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离开这三大宗教而研究中外文化的交流和比较,那将是很不全面和很不深入的。

一讲到宗教,大家都往往把它视为麻醉人民的鸦片和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正确的,但又不能绝对化。宗教事实上是一种深奥的文化,而且触及面很广,流传时代很久,在所有阶级和阶层人的头脑中以及行动中都会留有深刻的烙印。完全抛弃宗教去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也是不可能的,西方人把宗教称为“宗教科学”(La Science religieuse)的意义也正在于此。但是,对宗教文化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进行分析,全盘否定或全盘继承都不妥,糟粕和精华必须分开。我们不辞辛苦,不揣简陋地翻译谢和耐教授这部世界名著的目的也正是向中国读者介绍外国学者是如何研究这一系列既是老生常谈,又从未获得满意答案的棘手问题。当然,此书也不单纯是一本宗教学著作,而是涉及到了中国思想文化的许多领域。

近年来,各国学者对于16—18世纪入华耶稣会士们的功过作了大量研究。中国学者也改变了过去那种简单否定的态度,开始客观和公正地评论这些人物的历史作用了。他们虽然是资本主义向海外扩张和掠夺政策的产物并为之服务,但他们在华期间向中国传播欧洲比较先进的现代科学,尤其是天文学、舆地学、医学、哲学、历史学及工艺,同时又将古老的中国文化传向了西方。他们是西方汉学研究的奠基人,也是第一批认真而深入地研究了中国国情的西方人。我们不能低估

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对于他们在华办学堂、开医院、从事天文观察、测绘地图、著书立说等工作也应作出公正的评价。过去，我们在这一问题上采纳了绝对化的态度，过份的批判太多，公允的评价太少，甚至形成了一个研究禁区。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鼓励下，我们相信今后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会取得重大进展，对此作出一分为二的公允评价。

欧洲宗教改革之后分裂了的基督教分别被称为旧教(Catholicisme, 天主教)和新教(Protestantisme, 耶稣教)。由耶稣会士、方济各会士、多明我会士和遣使会士等于明清间传入中国的实际上都是天主教。《中国和基督教》一书中实际也是讲天主教的。但作者在书中分别使用了 Christianisme 和 Catholicisme 或 La Doctrine du Maître du Ciel 等词。为了不使读者产生误解，我们仍将 Christianisme 译成“基督教”，而将 Catholicisme 译成“天主教”。不过请读者注意，本书包括其标题中的“基督教”大多是指“天主教”，请不要产生误解。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本来想把本书中的“基督教”改为“天主教”（过去的许多译者都这样作过），但它在有的地方又确实是笼统地泛指新老教的共同先祖基督教而不是具体指天主教。为了避免混乱，只好保留传统的译法。

书中引用的中国典籍，凡能查出原文出处的，我们都尽量检出。其引文的断句、标点和分段均忠于作者的原文，它们可能与我国现行的标点本不完全相同。

译者 1986 年在巴黎时，与谢和耐教授谈到了自己想把此书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的打算。作者听到之后非常高兴，热情地为该书的中译本写了一篇序，在翻译过程中曾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他提出为该书的中译本加一个副标题：《中国和欧

洲文化之比较》。特此向作者表示感谢。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多方面的帮助。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同志化费了许多心血，审阅译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译者于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和欠妥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耿昇

1988年3月10日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中译本序

中国社会与希腊-拉丁和基督教的西方在一切领域中的传统之间的差异形成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研究课题。触及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可能就是研究中国于明末最早与西方交流时在中国引起的反应。实际上，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正是在这一时期进入中国并与中国最有文化修养的阶层建立了联系。这样一来，欧亚大陆两极基本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两种社会在历史上首次开始了真正的交流。这些远来的番夷人士以及传入的一切新鲜事物受到欢迎的方式、他们亲口叙述的有关中国人和中国的情况，所有这一切都具有特殊的意义。传教士们的主要关心是使中国人皈依他们自己的宗教，坚信中国人也会信仰基督教的真谛和普遍价值。但他们所遇到的困难本身也就说明了任何一种宗教都与它在其中发展起来的文明的政治、社会、伦理和哲学之间具有密切的和无数的关系。这就是我们从这些最早交流的分析中可以汲取的基本教益。这种分析也有助于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理解使中国和西方文明有别的地方。自明末以来，中国和欧洲都取得了重大发展，但现状从来就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希望理解现状的人就不能完全回避过去。

我的朋友耿昇先生已以无限的毅力非常准确地翻译了我

的一部著作和数篇文章，他仍希望翻译此书。我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法兰西学院教授

法国科学院院士

谢和耐(Jacques Gernet)

1988年1月4日于巴黎

目 录

译者的话	1
中译本序	9
导论	1
史料来源	8
第 1 章 从同情到敌视	22
一项诱人的事业	22
利用中国的经典著作	38
错误与混乱	47
气氛的恶化	62
冒牌的儒教徒	73
科学和宗教	86
第 2 章 宗教态度和同化现象	95
儒教士大夫	95
佛教僧侣	107
平民百姓	121
第 3 章 宗教和政治	157
上帝和皇帝	157
作为邪教派别的基督教	167

2 中国和基督教

颠覆的危险·····	186
第4章 中国人的伦理和基督徒的伦理 ·····	208
表面的相似性·····	208
身体与灵魂·····	216
人性与自我修身·····	221
因果报应·····	241
他们厌恶人生·····	249
使中国的圣贤和神祇堕入地狱·····	257
玷污中国的风化·····	267
第5章 中国人的天 基督徒的上帝 ·····	283
中国人的天·····	283
宇宙的动力(气)·····	294
创世·····	303
佛教徒的批判·····	311
化生·····	320
对原罪和神之完德的批判·····	335
语言和思想·····	344
参考书目 ·····	358
附录 谢和耐教授的主要汉学著作目录 ·····	365

导 论

本书的宏旨不是中国基督教史，因为它已是无数部著作的内容。本书的内容是讲中国人对这种宗教的反应，这是一个相对新鲜的领域。大家都比较清楚地知道传教士为归化中国人的所作所为，但大家对于中国人自己对此的议论却不大知道。我们应满足一种合情合理的好奇心。但这也是为了回答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在 17 世纪时，即在辩论尚未结束和尚未落入陈套之前，中国人的反应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它们是否可以说明西方和中国在人生观和世界观方面的基本差异呢？

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一问题可能根本不会提出：一种含蓄的心理学（我们的那一种）对于所有时代和所有社会都适用，足可以解释一切。对于传教士们本人来说，中国人也是与其他人一样，也就是说与他们自己相似，仅仅是中国人被迷信和错误思想所腐蚀，非常不幸地处于启示之外，只要为他们解惑并使之醒悟就足够了。如果说基督教只在中国取得了很少的成功，如果说它在那里成了受激烈攻击的目标，那只能是由于一些不利的原因。这种宗教改变了中国人的习惯，对一些过去形成的思想提出了置疑，特别是会冒损害当时已成定格之局面的危险。大家已强调了佛教僧侣们的嫉妒心情，他们

把传教士视为危险的竞争对手，看到了钦天监的职员和官吏被入宫的数学家耶稣会士们所排斥，在传教士和文人之间于有关平民的权力问题上发生了对立，在传播福音的努力与外来威胁之间建立了关系。当时的倾向曾是把基督教的敌人视为排外的保守派和仇视新思潮的人，把那些对传教士表示同情的人或直至让人举行洗礼的人视为一些比较独立于中国传统和比较向世界开放的人。大家曾认为可以把基督教与现代特征结合起来。但这种论点则与事实背道而驰：在从16世纪末年到1630年左右的中欧最早交流时，耶稣会士们在中国掀起了一场相当广泛的对他们的关心和同情运动，他们所完成的归化比这种善意的欢迎本来会使人预料的人数少得多。

当时的背景对传教士们并不太有利，最好的基督徒始终是传教士们能从儿童时代的学校起而培养起来的那些人。正如尊敬的史兴善(Vincent Shih)神父所指出的那样：“……个人依附于集体，而集体又屈服于传统……这就使一个传统社会的个体成员不可能接受任何新鲜事物，因而也包括接受福音书中的新鲜事物。无论如何，19世纪末的传教士们发现自己已处于这种进退维谷的窘境。为了使基督教能被中国人接受，他们就必须或是抑制传教的新鲜作法，或是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由于他们对于这二者都无能为力，于是就建立了一些基督教会口。”^①因此，传教士们的活动只有在不受中国的环境影响的隔离地区才会真正奏效。

但是，依靠一整套被所有人都接受的和每个人都很少能感到的(他把这一切都视为自然现象)传统则是任何一个社会

① 《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导论部分，第49页。

的特征，而并不仅仅是所谓“传统”社会所特有的现象。这些传统在历史中扎根，表现在每个人的行为、思维和感觉方式中，甚至表现在语言中。传教士们如同中国文人一样，无意中成了一整套文明的代表者。如果他们如此经常地遇到传统的困难，那是由于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以不同的逻辑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

在向中国人传播福音的问题上，绝不会有使中国人产生对新鲜事物的恐惧心情之危险，大家更不会想象在十七世纪时会有中国传教士赴欧洲以在那里传播一种被宣布为世界性的宗教。最好的办法只能是坚持这样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这就是搜集和分析中国人对传教士们阐述的观点及其活动所说和所写的好话与坏话，揭示他们的诠释错误以及传教士们在中国人的观念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这一课题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如果大家想到了这一切，那就该理解这是 在 1600 年左右，以彼此之间完全独立的方式发展起来的两大文明首次真正地开始互相交流^①。大家对哥伦布之前的文明所知道的很少一点内容实际上根本不可能与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古国中国的奇迹般的大量知识相媲美。

中国属于地处喜马拉雅山麓大屏障另一侧的人文和地理的组成部分。与此相反，占据了包括在恒河流域和地中海之间地区的文明则无疑是由于相对比较容易的贸易和人口的流动而造成的。印欧语言和社会制度向这一辽阔地区的扩张即

^① 在中国基督教历史的著作中，大家都习惯于重提在七——九世纪于唐京建立的一个景教教团、于 14 世纪初叶在蒙古人统治下的北京创建了一个天主教的总主教教区。这仅是历史上的新奇，唯有景教似乎才曾产生过某些影响，但它始终是叙利亚血统的商贾们的宗教。